

●李万健

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四十年出版情况概析

今年是新中国诞生40周年。40年来,我国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各项事业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得以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图书情报事业理论基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同样也经历了曲折前进、不断发展的40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专业科研和整个事业的发展上,专业著作的大量出版则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回顾并总结40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对于图书情报事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广大专业工作者从中了解学科的发展情况,明确未来的方向和任务,尤其是对搞好科研、著述,以及本学科著作的出版工作,更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想以个人之少见陋识对建国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情况作简要分析,旨在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抛砖引玉。

一、基本情况及取得的成就

40年来,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也显示了某些规律性。

1. 专业著作出版数量剧增,其基本规律是著作数量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起落

而升降。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8年,全国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包括目录学、文献学)的著作有600种左右(见表1)。

表1 1949~1988年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种数

年代	种数	年代	种数
1949	0	1969	0
1950	5	1970	0
1951	10	1971	0
1952	1	1972	0
1953	1	1973	0
1954	7	1974	3
1955	15	1975	5
1956	18	1976	1
1957	17	1977	2
1958	18	1978	4
1959	18	1979	11
1960	2	1980	37
1961	2	1981	23
1962	2	1982	54
1963	5	1983	39
1964	0	1984	61
1965	0	1985	71
1966	0	1986	64
1967	0	1987	55
1968	0	1988	55

注:1987、1988年为估计数字。

其中,图书馆学著作约有450种(约占75%);情报学著作有70种左右(约占11.7%);目录学、文献学著作有80多种(约占13.3%)。解放前的近40年(1911~1949)里,大约只有20几种图书馆学、目录学著作。600种同20种,真是不可相比。

纵观40年,可看到两学科著作的出版数量是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的。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升时期,专业著作出版数量也随之上升,反之,则出现低落。建国之初,国家政治、经济处于恢复整顿时期,专业著作出版很少,1950、1951年分别出书5种和10种,1952、1953年仅有一二种。1954年到1956年,国家政治状况好,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书数量逐年上升,到1956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年出书18种。1957年的政治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6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困难,专业著作出版数量大幅度下降。1960~1963年,每年只有一二种。1964~1973年近10年间几乎没有著作问世,1974~1976年每年也只有三五种。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短短两年的恢复,1979年就出书11种。进入80年代以后,专业著作出版数量逐年上升,由20几种上升到50几种,到1985年达到了最高峰(71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的黄金时期。建国后出版的600种著作中,有460多种是三中全会后的10年中出版的,占76%多。由此不难看出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工作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制约的规律(见图1)。

2. 出版的著作内容广,种类多,已基本覆盖了两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从各分支学科、各个专题都有著作出版的基本情况中,可以看出著作内容以反映实用技术方法为主流的规律,它说明图书馆学、情报学是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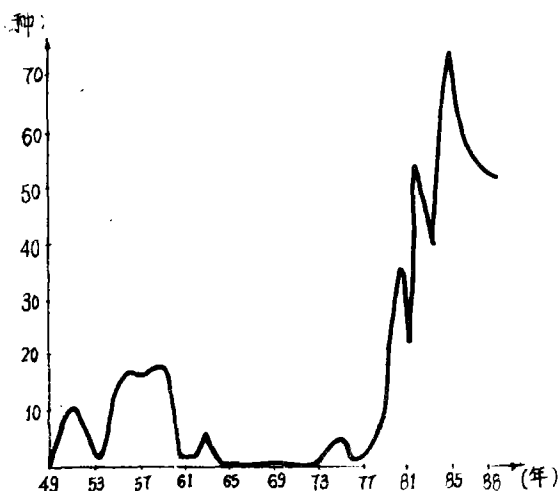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时期著作数量变化示意图

建国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的种类越来越多,涉及的学科分支及专题广泛而全面。旧中国出版的少量著作,内容仅限于图书馆学、目录学和文献学,情报学则根本没有,也不见有译作。建国以后,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图书情报事业建设和管理、图书情报工作的各环节上的各种工作方法和技术、建筑设备,以及专业工具书和业务资料等方面,都有大量著作出版。特别是在图书情报工作方法和技术方面,从文献收集到分类编目、整修保管、检索服务的各个环节,从传统方法到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都有许多著作问世。连以往很少有著作涉及的文献计量学、情报控制论及图书馆建筑设备等领域,近年来也都出版了多部专著。情报学独立发展时间较晚,著作也少一点。从出版的450种图书馆学著作来看,阐述工作和技术方法的有265种(占58.9%);对中外图书馆事业进行分析研究的有60种(占13.3%);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作研究的有40种(占8.8%);专业工具书和谈工具书使用的有40种(占8.9%);谈图书馆管理的有15种(占3.3%);其他方面的有30种(占6.7%)(见图2)。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图书馆学著作内容涉及全面的情况之

外,还能看到论述工作和技术方法著作占了多数的特点。它反映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技术性这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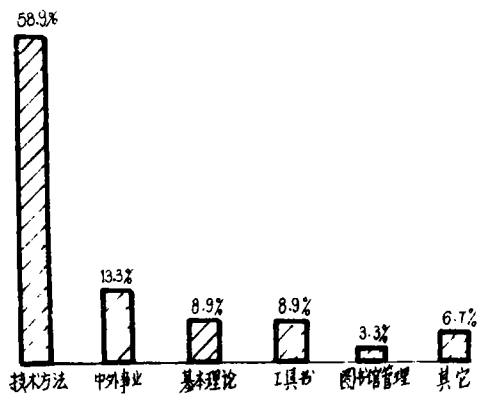


图2 各类图书馆学著作的比例

撇开著作内容,从著作、译作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译作比例之大是许多其他学科少见的。50年代,两学科里的译作只有俄文一种。自70年代末开始,英文、日文译本逐渐增多,英文译本成了译作的主流。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6年间,全国共出版图书馆学、情报学译作110多种,占此间两学科著作出版总数的22%(见图3)。如果从近10年的情况看,这个比例则增至近25%。这些译作为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提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发挥了较好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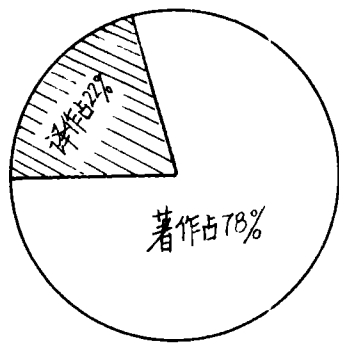


图3 著译作比例示意

3. 出版了一大批好书,促进了专业科研及图书情报事业发展。40年来,尤其是近10年里,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领域出版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内容好、适合科学研究和工作实践需要的好著作,受到广大专业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例如,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于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被确定为国家标准分类法的试用本,被全国大多数图书馆及情报单位采用,推动了文献分类工作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该书曾连续印刷14万多册,尚供不应求。1979年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主题词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许多图书情报单位用于主题标引,并成为一些专业词表的编表基础,对推广使用主题词法起到了很大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赖茂生等编著的《科技文献检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严怡民主编的《情报学概论》及陈光祚等编著的《科技文献检索》,均获得过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材奖。

此外,在基础理论方面,吴慰慈、邵巍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张琪玉著的《情报检索语言》等,对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独到见解,对课题理论体系建设有新的建树,受到欢迎和好评。在图书情报工作及其技术方法方面,刘国钧的《图书馆目录》、黄俊贵等的《新编图书馆目录》、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图书分类》、钱起霖的《汉语主题词表标引手册》、丘峰的《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朱天俊、李国新的《中文工具书》、刘荣等的《图书馆现代化技术》、史鉴、闫立中等译的《计算机化图书馆系统引论》、刘凤志等编译的《缩微复制技术》、王知津等译的《索引的概念与方法》等,在科研、教学,特别是实际工作中比较实用,对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有些书曾加印四五次,发行10多万册。在专业工具书方面,张蕴珊等编的《英汉图书馆学词典》、周智佑等编译的《文献与情报工作词典》、刘子亚等编的《英汉图书情报文献学

词汇》等,都是专业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工具书。

1. 建立了一批专门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的专业出版社,许多综合性出版社也大量出版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专业书的出版渠道增多。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使其专业著作的出版日益受到出版界的重视。

建国初期,国内没有专门出版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著作的机构。那时只有一二家中央级的出版社和个别地方出版社偶尔出版几种这方面的专业书,其中以中华书局为最多。建国后的前30年,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著作出版很难,大约有70%以上的专业著述是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利用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先后批准建立了书目文献出版社、科技文献出版社、专利文献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等一些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出版社。近10年来,国内有更多综合性出版社经营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图书的出版业务。其中有中央级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也有许多地方出版社,如广西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等;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到目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已基本上结束了以往那种出书无门的局面,专业著作的出版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专业著作出版事业的发展是适应专业发展而来的。它说明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兴旺。有一点应当指出,那就是在当前许多出版社争相出版图书馆学著作的繁荣景象中,多少隐现着一点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影子。尽管还只能说是有“一点影子”,但也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将不利于专业著作,尤其是那些读者面小而学术价值、实用价值高的著作的出版,从而不利于图书情报事业,也不利于专业出版事业的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及 对其的粗浅认识

建国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的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挥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应当看到其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必须改进和提高。

1. 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基本理论著作少,质量也有待提高。这个问题,其实是专业学术界和出版界双方的责任,但重点在于学术界。图书馆学是老学科,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但它们都存在建立、完善其基本理论体系的问题。对于整个学科或其各个分支学科来说,都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不清楚。例如,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其基本体系、结构是什么,至今众说不一。当然这有待于学科的发展去做结论,但在目前情况下能否有个相对的说法?在现有著作中,还没有一部为专业界满意的图书馆学概论、情报学概论、目录学概论的著作。这就形成了理论问题越是重要,却越是缺乏研究、缺乏著作的局面。应当说这是专业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大缺憾。诚然,科研,尤其是著作的出版,不能超越专业学术和工作实际,但以往我们对学术和事业实践的总结、分析也确实是很不够的。这里有专业工作者研究工作上的原因,也有目前我国行政上各自为政的原因。因此,往往不仅是图书馆系统和情报系统在科研、教学和工作中难以协同探讨共同的理论问题,甚至是不同隶属的图书馆系统也各有一套。这就很难做到从科学角度去阐明理论问题。但是,科学就是科学,不能因人而异。如果图书情报界能够团结协作,从科学出发,那么阐明学科基本理论的、相对高水平的成果恐怕是不难产生的,至少也会使目前的理论著作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2. 从选题的角度看,两门学科著作中译作比例大,但融会、吸收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来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做得不够;也存在传统课题的著作多,新课题内著作少的问题。

以近10年为例,在已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中,译作大约占25%。这个比例在其他大部分学科的著作中是少见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原因在国外,即英、美、日等国家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快,有许多值得翻译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国内从事图书情报工作的人懂外文的,做起来比较方便。适当译介国外的好作品对我们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目前专业著作的翻译中有相当的盲目性,有些人甚至是见书就译,如此做法,非但无益,反会添乱。另外,更重要的是,过多的直接翻译,反而会影响建立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因此,应当从外文书中吸收营养,编写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自己体系、结构和特色的著作,才会对我们的事业发展更为有利。武汉大学陈光祚教授等曾于1984年译出了兰开斯特的《情报检索系统》一书作为教材。近几年,他们又在吸收此书及其他外文书长处的基础上,编写出《计算机情报检索》书稿,用作教材,取代了兰开斯特译本,使该校的计算机情报检索课有了具备自己体系、结构的、适于国内教学的教材。就此一点来说,就是可喜可贺的。如果专业工作者都能注意避免过多的直译,而通过吸收外文书中的营养来哺育自己的著作,这对于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显然会更为有益。

关于传统课题和新课题的著作比例问题,从实际来看,以往的著中讲传统理论和方法而又缺乏深入和创新的显得多了一些;论述新题材,或论述旧题材但在理论上、体系上能有所创新的少了一点。例如,近10年来出版的有关工具书的著作不下10种,但多数只是介绍工具书内容及其使用方法,能在工具

书理论上提出系统看法的则少见。诚然,讲新东西,或者讲旧题材而能有新意是很难的,但这又恰恰是学科和事业赋予作者的真正责任。从难处着手,搞点攻关,写出有新意的著作,这才是读者欢迎的,是科学和事业所需要的。不注重于此,专业著作就会失去其意义,出版工作也会走入死胡同。

3. 专业出版物的质量有待提高。首先是著作内在质量需要提高。内在质量包括著作的内容、谋篇布局和文字技巧等。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由于内容冗杂,不合读者口味,或因文字低劣而受到读者批评的不少。产生这类问题的责任应由作者和编辑双方来承担,凡因作者写得不好,编辑选稿不准或改得不好造成的,要通过提高作者学术水平和写作技艺、提高编辑的专业和业务水平去解决。

其次是图书的印刷装帧质量需要提高。印装质量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出版社应努力克服困难,印出高质量的书。在装潢设计工作中,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同其他学科著作相比,是落后的。我们必须努力改进,使专业著作的外观有一个较大的改善。

4. 编辑力量不足,编辑的专业知识水平普遍偏低,业务水平也需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出版力量是比较薄弱的,编辑的人手及其专业知识水平、编辑业务水平很难适应工作需要。全国几家专业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而受过专门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人很少。各综合性出版社中则几乎没有专业人材去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图书的编辑工作。由于专业知识和编辑人手的限制,就很难适当地参与专业学术活动,很难看准学术动向,也难以组织高质量的选题和判别书稿优劣。就具体的编稿工作而言,书稿加工质量也往往很难保证。因此,必须加强专业编辑队伍建设,要吸收专业人材充实编辑队伍,要通过多种渠道对编辑进行专业和业务培训,提高编辑工作水平。

三、应当抓紧的两项工作

当今,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正处于发展时期,需要研究和阐明的课题很多。我国有几万名图书情报工作者,图书馆学、情报学有着一个可观的研究队伍,其著作拥有相当规模的读者群。这些都说明,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出版工作的任务是光荣、重大的,是大有前途的。要完成这一任务,今后要做的工作很多。通过对40年来图书馆情报学著作出版情况的回顾和分析,笔者感到有两项以往曾被忽视了的重要工作需要着力抓紧。

1. 组织专业学术界对重点选题进行规划,动员主要科研力量开展研究和写作,在重要的、又是以往难以成书的选题上作文章,出著作。

这里说的抓选题,不是指出版社通常的选题工作,而是指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开展协作,对专业领域里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某些基本理论问题等,进行规划选择,组织较强的科研力量进行研究,写出著作。在这一点上,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和群众团体,应当站出来脚踏实地地做些有利于专业学术、有利于事业发展的组织和支持工作。从以往的经验看,没有这种组织和支持,是很难有成就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权威性所以能得到专业界的承认,不是说它本身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恰恰是因为它是经过全国的专家的大力协作,尽了最大努力而产生的、在现阶段是相对完善的著作。对于目前图书情报界众说纷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这样的工作来产生应有的著作?这里决不是要排斥个人进行创作,只是感到应当采取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科研和著作选题中的重要问题。

2. 加强专业出版界同专业学术界的了解、联系和协作,加强出版社之间的协作,树立科学第一、事业第一、读者第一的思想,推动专业著作的出版工作。

专业出版界同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之间的了解、联系和协作,是出版社同作者的关系问题。这种了解、联系和协作,是推出更多优秀著作的力量源泉。作为出版社,只有了解学术界在干什么,目前需要什么,才能抓住动向,组织好选题,出版好书;学术界也只有把自己的好想法及科研上的积极成果介绍给出版社,才能得到支持,使自己的著作公布于世。这种相互间的了解、联系和协作,在过去是很不够的。此外,以往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出版社之间的联系也很少,协作更少。这也都是应当克服的不利因素。不同的出版社在加强联系、扩大协作的基础上,可以互通信息,交流经验,还可以共同承担一些大型著作或系列著作的出版任务,解决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不足。出版社同专业界的协作,也同样可以扩大到人力和财力上的相互支持。这样,就会推动专业著作的出版工作。

应当指出,加强出版界与学术界、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了解和协作,要建立在科学第一、事业第一、读者第一的思想基础之上。专业界向出版社介绍科研情况,推荐选题或书稿,要以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为重,以读者为重,决不可为了一己一家,甚至图名利而不顾学问真伪、事业兴衰、对读者是否有利,去游说于出版社。出版社也只有牢记科学第一、事业第一、读者第一的原则,才不至于为了一个选题而你争我夺,才不会为钱乱出书从而陷入误人、误事业的泥坑。这样的了解、联系和协作,一定会推动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的出版工作,也一定会更加有益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 15 (2)
. 14~26

This is one of the monographic papers writte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history of development, major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The 40 year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can be divided into 4 periods--starting period (1949-1955), developing period (1956-1966), stagnating period (1967-1976) and flourishing period (1977-). During the 40 years, 133 kinds of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nd 87 thesaurus have been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printed. The representative ones ar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chem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the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ies, The Chinese Thesaurus, and Thesauru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National Defence. Altogether 2, 871 papers on this subjec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108 titles of journals, of which the journal entitled Library Science Studies has publish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pers of the kind 183 papers on the subjec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while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one under the title Information Science have been most frequently quoted by other articles (92 times). Of the three well-known papers which have been quoted over 10 times each, 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entitled Comments on Major Classification Schemes Us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by Mr. Liu Guojun, which has been quoted for 48 times. There have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104 titles of books, 6 of which have been quoted over 10 times, with Zhang Qiyu's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s being the most frequently quoted one (86 times). 17 out of the 3, 151 monographic authors are considered productive authors, each h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10 monographic papers, with Bai Guoying as the most productive one having published some 62 papers. Papers by Zhang Qiyu have been quoted for 144 times, while other 12 authors have been quoted for more than 10 times for each. Those wh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s include Liu Goujun, Du Dingyou, Pi Gaopin, Li Xinghui and Zhang Qiyu. The author predicts after looking into the rest 11 years of the century that adoption of natural languages,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 automatic extraction, establishment of automatic search systems and realization of on-line search will be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search languages.

Illustrations 4. Charts 4. References 13.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Survey report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cheme--Evaluation

The Chinese Thesaurus--Evaluation

Information linguistics--China

G254

General Analysis of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Work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Li Wanjian //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 15(2). --27~32.

This is one of the monographic papers writte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re have officially published 600 titles of book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alysed by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the year of 1985 is the most prosperous year with respect to the pub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work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71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the subject deviation, 450 titles (75% of the total) are on library science, 70 titles (11.7%)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80 (13.3) on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ation studies. Among those dealing with library science, books concerning technical methods number 265 and account for 58.9%. Analysed by the proportion of writings against translations, 78% of the total are writings by Chinese authors or compiled by the Chinese, while 22% are translations from foreign books. Among those 600 books, th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cheme published by Bibliography and Documet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Thesaurus publish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s publish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General Introduction into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s published b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have won the national awards. After reviewing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point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author suggest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wo jobs—planning for researches of major professional issu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circle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 circle on the one hand, and between publishers on the other.

Illustrations 3. chart 1.

Library science --Works

Information science-- Works

Publishing work --China

G23

Discussion on nonsubject for Books of Anthologies of Writers/ Luo Lin//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 15(2). --33~35, 13

In classification for four Classics of Books of China, the Classics Histories and Schools have more definite and concentrated subjects, but anthologies of Writers have not. That is Classics, Histories and Schools take subject matter (subjects) as standards of classification, but Anthologies of Writers take types and forms (nonsubjects) as the standards f classification. The nonsubject Anthologies of Writers began with Versed Poems of "QI LUE" and went through Versed Poems of "Histories of Han Dai. Records of Arts and Literature", Dpart of "ZHONG JING XIN BO", D part of "Catalogue of Classics of Books" and Records on Scholars of "Qi Records" and falled into a elementary pattern at "Summary of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for Four Classics of Books". Actually all documents have distinction of subjects and types, that is specific and general characters. In classification for four Classics of Books, when subjects and types have contradiction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ubjects; when subjects are self-contradictory, classified into Anthologies of "Writers as into Classics, Histories and Schools. So the relations between Anthologies of Writers and Classics, Histories and Schools are dialectical."

Classification for Four Classics of Books --Surveys